

秦惠英，你在哪里？

她曾被作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而广为宣传；为了公众的利益她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女生们一字排开将她轰出宿舍；学校里的浴室和厕所她无法使用；她对一个不知情的女生说：“我欢迎你住在这里，但你离开我也不会怪你”；男友要求和地作爱，她与其说是不愿意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性别问题”她再次失去工作；她终于隐姓埋名，放弃唤醒公众的努力……

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秦惠英，任何一本关于中国变性人的著作都无法回避秦惠英。她曾被作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大为宣传，虽然这与实际的情况有一定偏差，但她无疑是中国第一个向公众社会自我曝光的变性人。她的照片广为刊登，她的经历家喻户晓，她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果哪一天，我们对中国民众的观念演变做一番全面而细致入微的回首的话，我们无法回避民众对变性人态度的演变，也就无法回避秦惠英。秦惠英以她的自我曝光，实现一种升华的人生价值。

一年夏天，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的何清濂教授接待了一个特殊病人。这是一位瘦弱的男青年，自我介绍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叫秦惠荣。秦惠荣同何教授说了很多，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对于生命的感觉……无愧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知识和见解都令何教授耳目一新。最后，秦惠荣把一个难题呈给了何教授：“教授，我想做变性手术。”

秦惠荣就是日后的秦惠英。

秦惠荣是个农民的儿子，他的父母都是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农民，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秦惠荣是这个家庭里的长子，在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秦惠荣自幼勤奋好学，成绩出色，和男孩一起玩耍，是一个男孩气十足的典型男孩，没有任何女性化的倾向。

秦惠荣考入初中那年，正好13岁。13岁是少男少女进入春心萌动的年龄。当班上的男同学开始对女孩子发生兴趣的时候，秦惠荣却发现自己变了，那是一些迷幻般的变化。他变得内向，再也不爱和男孩子在校场上玩闹，而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中，凝视静思，同时对女孩子的性格和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女性的温柔和女装的艳丽，常常梦想自己也能穿上这样的衣服，成为一个娇丽的女孩子。

文/方刚



“作女孩子真好，我应该是个女孩子。”13岁那年，秦惠荣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女人呢？我为什么偏偏是个男人呢？”秦惠荣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行为举止出现了女性化。

他笑的时候喜欢用手掩嘴，害怕的时候捂着耳朵大喊一声“哟”，一个人呆着的时候爱照镜子，爱梳弄头发，爱拿块手帕扭着屁股走路……他从这些举动中感到许多快感。

秦惠荣学习很刻苦，热爱读书。高考时，他一举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成为周围几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乡邻们又说：瞧，扮女孩子使他的命运有了多大的改变呀！

当秦惠荣开始大学生活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生活了。

那是1981年，秦惠荣的女性化倾向发展到极点，发病时无所适从，男性生殖器成了压抑、嫉恨的累赘。他购置了不少女性服装，悄悄地将女装穿在里面，外面罩上一件男装，有时干脆将女装穿在外面，过一过女性的瘾。

住在男生宿舍里，秦惠荣感到恐慌。夏天男生在屋里很放肆，一条松松垮垮的三角裤什么也遮不住。有一天，秦惠荣竟然在宿舍门上贴出一条抗议的字条：请大家自爱，别穿短裤。为此，引得一些同学的讥笑。

秦惠荣是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知道人是可以变性的。从那一天起他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了，知道自己真正的人生将从何处开始，也就是在那前后，他还看到报纸介绍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何清濂教授的高明医术，于是，他看准了何教授，相信何教授可以帮助他、改变他。

然而，当他真的向何教授提出这个要求时，无疑给何教授出了道难题。变性手术何教授也曾听说过，在国外也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在中国还闻所未闻（当时北京夏兆骧教授做过的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尚未被媒体曝光）。改变一

个人的性别不像割双眼皮、去掉一个瘡子那么简单，它必然牵扯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哪里是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可以决定的呢？除了讲清道理、委婉回绝，何教授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但是，秦惠荣并不甘心。易性癖带给他的痛苦一天不消除，他就一天不会放弃做变性手术的念头。外国人可以做变性手术，中国人就一定也能够做。如果说以前没有，那就从他开始吧。

大学毕业后，秦惠荣被分配到云南一所高校作教师。这时他将所有的男装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买了许多女装及化妆品进行打扮。看看镜子里经过化妆打扮的自己，心里高兴极了。

秦惠荣继续给何教授写信，谈变性的要求，何教授仍规劝他不要走这一步。

为了促使何教授给他做手术，秦惠荣采取了过于偏激的行动——自残。对于男性性器官的厌恶由来已久，医生不能割除它，那就自己动手吧！1987年12月26日晚，在一个寒冷的日子，秦惠荣出现了无法抑制的心理烦躁和骚动。他准备好一把锋利的刮胡刀片，用酒精消毒了毒，然后眼一闭，向自己的阴囊狠狠地划去……两个睾丸被切去了，阴茎也随之致残。顷刻间，鲜血直流。疼痛与鲜血使秦惠荣力不能支。当时因大出血，秦惠荣被送到医院治疗，住院8天，花了1000多元医疗费，始得获救。此后，他被视为“道德败坏”、“不宜工作”，被清除出教师队伍，退回上海。就在他等待分配工作期间，病态又有发展，继续实施其切掉阴茎的计划。他不顾经济困难，省吃俭用，花100多元购买了一套手术器械，于1989年11月动手将自己的阴茎连根切断，欲求排除阻挠自己成为女人的“最后障碍”。

但是，秦惠荣仍未能从自残中得到真正的解脱，他一连给何教授写了14封信求救。

第二次自残的结果是，秦惠荣的尿道口过于狭窄，排尿困难，异常痛苦。

这段时间以来，面对秦惠荣的自残

和痛苦，何清濂教授也在思考着。医生的使命是治病救人，面对秦惠荣，何教授再也无法平静。秦惠荣是一个自强的人，何教授相信，变性是他的心理要求，变性之后他会好好做一个女人。更重要的是，秦惠荣排尿的痛苦也急待解决。何教授和医院领导认真商量，最后决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了解决秦惠荣的排尿问题，将他残存的男性生殖器官切除，而以人造的女性生殖器官取代。虽然医生们回避了“变性”这个词，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次变性手术了。

为了使秦惠荣更好地走上工作岗位，手术安排在1989年7月。复旦大学的有关人士对秦惠荣的决定表示理解，并答应在他变性后提供种种便利。

手术进行的十分顺利。7月5日是第一次手术，将残缺的阴茎切除，利用敏感皮肤改造阴部，造成阴唇、人工阴蒂和新的阴道，尿道改植为女式；第二次手术是8月10日进行的，为秦惠荣做了突乳手术，造就了一对漂亮的乳房，两乳对称，手感柔软，喉结切除术也做得很好，使这个经历了15年痛苦的秦惠荣变成了长发披肩、眉目清秀，带有几分羞涩的真正的妙龄女郎。

至此，我们该以“她”来称呼秦惠荣了，她在术前术后判若两人。

也就是在接受手术的这段时间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秦惠荣躺在床上，思考着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易性癖者，她回首自己人生的苦痛和为变性付出的艰辛。医生说中国有许多像她这样的人，她在心里感到庆幸，庆幸自己能够变性，可同时也有一种伤感，想到那众多如她一样的人们仍承受着痛苦，仍忍受着周围人群的歧视，秦惠荣觉得自己的快乐也不复存在了。

“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变性后的秦惠荣一遍遍问自己。有一天，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际：如果我对社会公布自己变性人的身份，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去影响人们，大众社会就不会歧视易性癖者，广大易性癖者也知道可以通过变性来获得幸福，医生们做变性手术的阻

力也会小一些……

秦惠荣被这个想法激动着。一天，秦惠荣敬重的何教授查房时，她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没想到，何教授坚决反对：“你是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群众的认识离接受变性手术的现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你公布自己的身份，只会使生存变得困难。”

“但是，教授，正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个变性人，我才要公布自己的身份，给易性癖者一个榜样，更帮助大众改变认识。如果永远没有人站出来，大众的认识就永远不会改变！”秦惠荣坚持着。

何教授被她的精神感动了：“你一定要慎重，一定要考虑周全，一定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后果……”

秦惠荣真诚地说：“教授，您放心吧，我这条新的生命是您给的，为了公众的利益，我冒点险，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秦惠荣下决心公布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她相信自己美好的意愿终究会得到美好的报偿。她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她不得不又更名改姓、藏匿起来。

在公开身份之前秦惠荣改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放弃以原来的姓名、以一个变性人的身份面对社会的努力。一个新人就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秦惠荣这样想。于是，她有了秦惠英这个名字，并且立即把这个名字对媒体公开，以新的身份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

中国出现了变性人！这本身就是一个记者们趋之若鹜的新闻。《文汇报》最先报道，紧接着，中央电台和电视台，港澳台的电视台，东京、纽约、巴黎、莫斯科的电台，《解放日报》，《人民日报》，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台湾《世界日报》，新加坡《联合日报》以及 20 多家期刊均先后做了报道，秦惠英的照片满天飞。许多人都记住了那个原先戴着一副眼镜，而今明眸皓齿的漂亮女郎形象。

我看到了几张秦惠英刚做完变性手术之后的照片，有她在何教授办公室里的留影，有她同何教授的合影，特别是一张她对镜梳妆的照片，顾盼生辉，



从眼底向外流淌着幸福、快乐的感觉，没有人能不受到感染。那时她刚刚勇敢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份，她在照片上向人们微笑着，她相信人们会理解她……

雪片一样的来信飞到何清濂教授的案头，众多的易性癖者纷纷找上门来，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人们对易性癖和变性人由无知而开始了解，那么距离理解也就不会太遥远。秦惠英，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影响着公众，改变着世俗的观念。

但是，公众的反应并不是一致的，有理解，有同情，同时还有不以为然，有看稀奇的，有讥讽嘲笑的，有作为丑恶现象鞭笞的。《文汇报》最先报道后，秦惠英和何清濂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为什么要做这种手术，这不是助长流氓分子的气焰吗？”

“这同泰国的人妖有什么区别？！”

“老何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医生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甚至有人还对《文汇报》的报道表示不满，“做这样的报道社会意义何在？”

何教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最大的压力加在了秦惠英的头上。

首先是她的家庭感到愤怒。秦惠英曾经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们的骄傲，对于农民来讲，拥有一个儿子的意义已

经不必说了，如今这个长子竟变成了“长女”！秦惠英的父亲找到长征医院，大有同医生们决一死斗的架势。医院解释，秦惠英已经自残，医院采取的措施是为了解决她排尿的困难。但即使如此，这位父亲在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竟没有和秦惠英说过一句话！同样疏远的亲人还有秦惠英的弟妹们，拥有一个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哥哥被他们引以为荣，如今这“哥哥”成了“姐姐”，让他们怎么对人解释，怎么面对周围那些讥讽的询问呢？

秦惠英的工作成了问题。虽然学校已在有关文件上都更改了秦惠英的性别，但她原来是男人的事实已广为人知。一家原准备接收秦惠英的单位借口“我们这里女同志太多，需要一些男人”为理由拒绝了。

另一家单位则说：“我们职工的水平差，没法理解变性人，怕她来了之后日子不好过……”

秦惠英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了。没有工作，她还得住在学校。那天，当她从医院回来后，拿着行李到系里安排给她的宿舍时，同宿舍的 5 个女生一字儿排开，向她提出最后通牒：限 10 分钟内离开！理由是她们不能和一个“男生”同住一起。但是，秦惠英也不可能回原来的男生宿舍了呀！

后来，学校为她专门找了个小房间，总算安顿下来了。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比如她一进厕所，所有的女生都像逃瘟疫似地赶紧离开，而她到女浴室洗澡，总会有大胆泼辣的女生将她的脸盆和衣服扔出去，并大叫着抓流氓。

作女人呀，为何如此艰难！

但秦惠英对此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不能使用学校的厕所，就到校外上厕所；不能在校园里洗澡，就打盆水在房间里简单地擦一擦，每星期再到公共浴池洗澡。

这期间，曾经有一位后来工作于上海某家报社的女孩子在复旦大学进修，校方考虑到秦惠英住的房间一直是她一个人，便将这个女孩子安排住在那

里。但是已经有些经验的秦惠英不愿意对女孩子隐瞒自己的情况，担心日后她知道了觉得受了伤害，所以那个女孩子刚走进房间，秦惠英就告诉她：“我很欢迎你住在这里，但是你有权利知道我是一个变性人。我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女孩子了，但我曾经是一个男人，知道这些后，如果你认为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很感谢你，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向系里提出来换宿舍，我不会责怪你。”

女孩子很吃惊地看着秦惠英，最后还是换了一间宿舍。那个女孩子后来对人说：“我从秦惠英身上看不出一点男人的影子，我也不歧视她，但是……但是知道她曾经是男人，思想上总无法一下子转过弯儿来。”这其实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复旦大学一直为秦惠英的就业问题做着努力，一所学校决定接受秦惠英，复旦大学和秦惠英本人都没有特意提她是一个变性人的情况。那学校在一座偏僻的小城，没有人把眼前这位女孩子与那个在报纸上一度沸沸扬扬的秦惠英联系在一起。

秦惠英在学校里工作得很认真，她讲的英语课细致入微，颇受学生们的欢迎。她的人生似乎要稳定了……

作为一个女人，秦惠英也需要爱情，需要过一个女人正常的生活。追求她的男孩子不止一个，但她很慎重。她知道自己的特殊情况，她不愿意因此伤害别人也伤害她自己。经过认真考察，她选择了自己单位里的一个男同事建立了恋爱关系。初恋使秦惠英生活在甜蜜当中，那段时光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候，没有精神负担，尽情享受爱情，享受作女人的感觉。但秦惠英也在等待一个机会可以委婉地告诉自己的男友，她是一个变性人。她爱他，不能瞒着他。然而，一个自然吐露真情的机会还没有来到，她却不得不在另一种状态下被动地说出真相。

悲剧发生在4个月后的一个晚上。那天是周末，同秦惠英住一间宿舍的女人在外地出差，秦惠英的男朋友提出和

她作爱。

后来秦惠英曾坦率地同人谈起那次经历。秦惠英说，她对发生那种关系与其说是不愿意还不如说是不敢，因为医生曾经在她出院时再三忠告，她的器官是人造的，需要生长、适应，一年之内还不可以和男人性交。

秦惠英拼命抵抗，那个男青年沮丧地看着她。面对他的眼睛，秦惠英只得把计划以后说的话提前。她告诉他，她是变性人，曾经是男人，就是那个秦惠英。那一刻，秦惠英望着男友的眼睛，她多么希望从那里看到理解与爱呀，但是……秦惠英永远无法忘记那突然射来的鄙视的日光，过去的甜言蜜语不复存在了，男青年起身离开她的房间，没有回头。

昔日的恋人显然没有替秦惠英保守秘密。转天，学校工会的领导便找她谈话，要她“交待”性别上的“问题”。秦惠英知道，要理解这种现代科学成果需要高度文明，可是那里人们几乎还处于五六十年代的思维中，不可能接受一个男变女的人。

果然，学校行政上迅速作出反应，这种人我们无法接受，退回原学校！

中国第一个自我曝光的变性人，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但秦惠英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她对何教授说：“我的处境越不好，越说明我的自我曝光是对的。没有一个人作出牺牲，那么多的易性癖者走出社会的阴影岂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何清濂教授被秦惠英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身处逆境，她竟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表态，可歌可泣！

帮助秦惠英就业的努力一直没放弃。终于，一所业余大学接受她去做英语教师。秦惠英很高兴，何清濂教授也为她高兴。但是，何教授这一次坚决反对秦惠英再公布自己的身份和照片。

“你已经受了那么多打击，应该明白，要让人们接受变性人，还需要很漫长的路。”何教授说。

“但是，多么远的路都要从脚下走

起。”秦惠英坚定不移地说。一个弱女子，在做着一件不平常的事。

然而，中国的民众真的都能接受她吗？

1994年，中国许多读者又看到了秦惠英的照片，知道她在一所业余大学作英语教师。其中有一张是秦惠英正在资料室里查阅资料，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虽然秦惠英还在微笑着，但那眼神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忧伤。也许，当她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那以后的一年间，关于秦惠英的消息从媒体上消失了。

1995年6月，我在上海采访易性癖与变性人的情况，不止一个人对我提到：“中国第一个公布身份的变性人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我的脑海中立即闪过秦惠英那略带忧伤的目光。

我问：“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详情。朋友们只是告诉我，听说她在那所业余学校也没有呆住，在过去的一年间，她换了几个地方，如今，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采访了何清濂教授，我相信不论世情怎样伤害秦惠英，何教授这里都会是她心灵永久的避风所。

然而，何教授对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他只是肯定了秦惠英在四处漂泊，并且再次改了名字，这一次是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

秦惠英每过一两个月便给何教授来一封信，每次都很简短，仅仅是报平安，并不多谈自己的情况。来信也没有地址，何教授也不想给她回信。“为了保护她。”何教授这样说。关于秦惠英的现状，何教授说他也不知道。

何教授真的不知道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考究了，我们清楚地知道的是，秦惠英终究没有因为公布自己变性人的身份而获得公众的理解与同情，相反，最后却落得一个不得不隐姓埋名的结局。

秦惠英，你在哪里？你生活得可好？

（栏目主持人：易东升）